

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化版图

□ 王建伟

摘要:民国建立之后,随着王朝的解体与帝制的消亡,原有政治势力逐渐分崩离析,固有的文化体系也随之产生裂变,“帝都”北京传统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文化环境的更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从南方涌入北京,市民阶层壮大,女性地位上升,农业社会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社会风气日渐开放,生活方式趋新,民众日常文化生活有了新内容,新的社会时尚逐渐确立。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古老封闭的“帝都”催生出一系列崭新的文化气象,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化版图进一步更新了自身的形式与内容。

关键词:北京;文化版图;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5)04-0107-08

民国的建立是中国政体由专制转向共和的标志性事件。作为长期的国家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政治环境的变动对北京文化面貌的更新有着深远影响。但从一个更长时段考察,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化图景其实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早在清代后期就已随着西方新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涌入而发端。不用追溯得更早,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国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省。庚子年间北京的沦陷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文化自信,曾经异常稳固的心理防线瞬间解体,帝都成为战场前线,再也无法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以此为契机,北京加速并入现代城市文明轨道。庚子年之后的北京,实际上已经启动了文化更新的最初程序,进入民国之后,这个进程只是加速了而已。

一、报界波澜:民初北京文化气候的风向标

19世纪末期,与上海、广东等开埠较早的国

内城市相比,北京不仅在现代化程度方面明显逊色,而且在政治风气上也非常保守,一批政商要人与新式知识分子大都在远离这座帝都的地方进行着他们各自的事业。尤其是上海,自晚清以来逐渐成为西学传播中心,戊戌以及庚子之后,这里形成了全国最为发达的文化事业,涉及出版、教育等多个领域,众多新式知识分子在此聚集,上海的文化地位持续上升。但在中国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格局中,北京的优势地位一直不可忽视,从最初的创办报刊、启蒙民众到后来的政党办报、影响舆论,北京对全国的引领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比拟。

庚子事变之后,配合宪政风潮兴起与民族危机意识高涨,中国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展开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北京民众对报纸、演说等现代舆论手段的接受。进入民国之后,政体发生根本性变更,共和体制确立,临时政府北迁,大批国内政要、国会议员

作者简介:王建伟,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等纷纷从南方北上,一时间各色政党、团体纷纷出现在北京,以便在即将选举产生的国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北京城再次成为各政治势力展开各种活动的最中心舞台。

由于言论限制的松弛,舆论开始成为新的“工具”,办报之风席卷全国,多个政党纷纷在北京创办自己的报刊,力图通过舆论场域的胜利为政治斗争的天平增加“砝码”,多年来政治氛围异常沉闷的北京空气也为一变。据统计,1911年仅有10余种,1912年2月向民政部立案登记的报纸已经达到90种左右,实际出版的新报纸有50多种,占全国新创报纸的九分之一,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近代中国报业中心上海。^①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报纸、期刊仅出版几期,部分报刊内容也十分单薄,但如此众多的报纸、杂志的长期出版或相继更替依然为北京营造出一个各自为主、众声喧哗、相互竞争、充满生机的舆论与传媒环境。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的一大特色即“政党办报”,报人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政治人物也大多插手报业。当时国会中形成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阵营,北京各报也基本分属两大报团。国民党系包括《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亚东新报》(宋教仁创办)、《民主报》、《民立报》、《中央新闻》等同盟会会员所办报纸,它们在京成立“国民党新闻团”。《国民公报》、《新纪元报》、《亚细亚报》、《中国公报》、《民视报》、《京津时报》、《新中华报》、《北京时报》、《中国报》、《国权报》、《黄河报》、《国华报》、《大自由报》等17家报纸共同在京发起新闻记者俱乐部,与同盟会系报纸分属不同阵营。在这些政党报刊中,有许多是政党政治的鼓吹者,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憧憬之情,那些因政党而设的报刊,同时也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的繁荣建立在当时政党政治勃兴的基础之上,当政治环境变化,这种局面也将不复存在。1913年宋教仁被杀,二次革命爆发,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几乎全被封禁。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恢复帝制,进步党人也无立身之地,政党政治在袁世凯的专权下逐渐瓦解。袁世凯当政时期,非常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监督,于1914年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等,利用各种法令,限制言论自由。一度十分兴隆

的报界在袁氏打压之下,陷入困境,“综计1912年4月至1916年袁世凯当权期间,新闻记者有60人被捕,24人被杀。”^②北京由于所处政治前沿地带,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国民党系报纸几乎全军覆灭,余下的其它20余家报纸“无一敢言”,“皆如寒蝉仗马,不着一字。即有一、二卓卓者,亦不过于报纸纪事中稍参以皮里阳秋之笔,令有识者于言外求之耳。”^③大多报纸甚至放弃了对时局的评论功能,一向以时事评论为主旨的北京报界逐渐转向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旨。

袁世凯去世之后,国会重开,议员北上,政界各派人物再聚京城。北洋政府废止了袁氏制定的《报纸条例》,解除报禁,北京报界复苏的趋势最为明显,报刊数量猛增,仅仅两三月内,复刊和新办的报刊就有70余家。^④这些报纸代表不同的政治集团,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局面:“近数月以来,京内新闻事业,异常发达,商家政客以及党派,莫不各有一张报纸以发表其意思。”^⑤当时的论者即已指出:“北京报纸最进步最上轨道之时代,不在民国元年民权勃兴之时,而在民国五年与六年民治受创之后。”^⑥

在北京报界复苏的同时,一批没有政党背景的民营报纸也开始兴起。蔡元培、邵飘萍等一批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希望通过办报开启民智。1915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创立第一个民间自办的通讯社“新闻编译社”。1916年6月,《晨钟报》创刊,原为研究系的机关报,后改名《晨报》。1917年1月章士钊在京创办《甲寅》日刊。1918年10月,邵飘萍辞去《申报》特派记者,集资创办《京报》,这是民元以来不多见的没有政治背景的华资报纸,着重报道和评述时局,讲求新闻的时效性与真实性,在邵飘萍手中,华资报纸完成了政党报纸向商业报纸的转化。《京报》创刊后,最高发行量达6000多份,在北京华资报纸中影响最广。同年,邵飘萍与蔡元培、徐宝璜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把《新青年》迁至北京出版,后来陆续出现了《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语丝》等报刊。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了《世界晚报》,同时还出版《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为中国第一张画报),副刊连载张恨水的多部长篇小说,吸引了大量读者,日销量最高达4—5万份。

二、从戏曲到电影：娱乐方式与社会新时尚的确立

长期以来，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双重地位决定了北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城市，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活紧密围绕政治权力构建。明清以来，“国都”身份对北京文化面貌的塑造发生了重要影响。这里聚集了大批不事生产的人口，人口的职业结构决定了城市的消费性质，旗人的悠闲、官员的富有、士大夫的趣味、商贾的集中，也为北京娱乐业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小说家倪锡英就在1936年描述北平“可说完全是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那里，生活的环境，是十分的伟大而又舒缓。不若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生活那么样的急促，压迫着人们一步不能放松地只能向前，再也喘不过气来。又不若内地各埠那么的鄙塞简陋，使人感受着各种的不满足”。^⑦蒋梦麟也认为北京“是历代的帝都，也是艺术和悠闲之都”。^⑧后来，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这种情形做了非常精到的描述：“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象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⑨

娱乐方式是我们观察北京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窗口。清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逐渐走向顶峰，京城社会文化消费市场异常发达，市民的娱乐文化丰富多彩，娱乐的物质载体——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遍布内外二城。民国初年的北京，仍然聚集众多新旧权贵、富商巨绅、军阀政客，商界随着军政人物繁忙的交际活动起舞，社会经济活跃兴盛，各类消费行为热络，呈现出“动”的、繁荣的北京景象。虽然1920年代进入军阀混战的阶段，战事时而波及北京市面及民生，

却未影响权贵富户与政要人物的笙歌享乐。^⑩

在民国北京的艺术舞台上，戏曲、曲艺等娱乐行业非常发达，这些艺术形式恰恰适应了京城自在的生活节奏，京剧、昆曲、评剧、大鼓、单弦、相声等曲艺形式在京城都有广阔的观众市场，即使在普通劳动者中，也有众多的戏曲、曲艺爱好者。民国时期有第一舞台、开明戏院、新明戏院、新罗天剧场、万胜轩戏园、小小戏园、天乐戏园、小桃园、丹桂戏园、小吉祥戏园等，观众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涉及社会各阶层。源自大江南北的艺术逐渐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京剧最受欢迎，“北京为京剧之出产地，上自公卿贵族，下逮编户齐民几乎无人不喜唱戏，故北京戏园之多，亦甲于全国。凡诸名角均须与京中得名方有价值，洵乎剧界之冀北也。”^⑪

对于京剧而言，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皇朝帝都都是京剧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这里聚集了最广大的消费群体与最杰出的专业人才。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始，北京的戏剧演出活动日渐丰富，京剧这一艺术门类逐渐孕育与成熟。同治年后，京剧的艺术形式日益完善，演出市场最为繁荣。晚清内廷供奉的盛行，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戏剧的姻亲关系。进入民国之后，北京仍是首都，政府官员仍是举办堂会的主体，而前朝的遗老遗少在丧失政治权力之后，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娱乐休闲之中，京剧仍是重要选项。同时，在与政治的关系有所疏离的情况下，戏剧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新兴广大市民阶层的趣味与需求成为促动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力量。

同时，京剧这一艺术门类自身也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早在清末政治体制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戏曲作为舆论宣传、民智启蒙的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运动中。进入民国之后，随着电影等新型娱乐样式的兴起，对传统京剧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从而加速了其改革，梅兰芳是代表性人物。京剧形成的最初阶段，老生唱腔是主流，男旦^⑫一直处于附属地位。清代既禁女戏，女伶自然式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排演了时装新戏《孽海波澜》、《幻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从念腔、曲调、念白、做功、舞台到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方面都对京剧进行了革

新,使男旦艺术达到艺术之巅,开辟了京剧艺术的新天地。

旦角取代老生,有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民国建立前后,戏院内男女分座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一批女性观众开始进入戏院,由于对京剧艺术相对生疏,对唱腔、内容等并不十分看重,而更注重身段、扮相等外在因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旦角的盛行,引发了戏剧界的变革。正是作为审美新主体的加入,使得京剧演员的表演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向。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女旦,政府不再明令禁女角演出,京剧表演中出现了男女同台局面,台下观众男女合座,允许演出夜戏,这些因素为民国北京戏剧市场带来了新的风貌。1912年5月22日,俞振庭的双庆班在广和楼演出的《红梅阁》、《失街亭》等戏曲采取男女合演的方式,令北京观众“耳目一新,趋之若慕羶之蚁,嗣移文明,生涯益盛,各园闻风兴起,群作业务上之竞争”。^⑬

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娱乐中心与商业中心如影随形,商业发达之处往往聚集着众多娱乐场所,娱乐业的兴隆往往依托于商业中心的繁荣。以外城前门一带为例,这里流动人口密集,商铺林立,商业繁盛,“繁华市井何处有,大栅栏内去转游”,^⑭多家戏园(如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广和楼、同乐园)集中于此,对于嗜好戏曲的北京百姓而言,前门地区是娱乐生活的首选去处。

随着戏曲演出市场的日渐兴隆,内城不准设戏园的禁令被打破。演出场所也逐渐从旧式戏院向新式剧场过渡,剧场设施得到很大改善。1908年2月,位于东安市场北门东侧的吉祥茶园开业,名为“茶园”,但园内设有舞台,演出活动众多,观众踊跃。不久后又在东安市场建起丹桂茶园和中华舞台。民国建立之后,在东安市场附近又建立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协和医院礼堂和真光影剧场、光陆影剧场等,王府井地区成为北京城内的剧场密集区。

与此同时,北京的戏剧演出进一步商业化,由于前门商业区向南发展,珠市口、虎坊桥一带陆续出现了文明园、开明戏院等。1914年1月,杨小楼会同名旦姚佩秋以及商人殿阁仙等,在珠市口建成了一座能容纳2600名观众的“第一舞台”。香厂商业区开辟之后,1918年相继建成了新世界

和南城游乐园综合商场,新世界内设有女戏场、电影场、茶楼、京津杂耍场、说书场等。南城游乐园内设有坤剧场、文明戏场、电影场、魔术场等,还建有新明大戏院,成为新的剧场群落。此外,天桥地区也是北京底层居民最主要的娱乐场所,戏曲与杂技是重要的娱乐内容。

除戏院外,茶楼在北京人的娱乐生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很多的茶楼除了供人休闲、饮茶外,也有戏曲演出,以吸引顾客。至民国初年,以近代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娱乐场所如电影院、游艺场、舞厅、球房等开始在北京出现,其中,以电影对市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最为广泛。清华大学毕业生刘昌裔在1930年代完成的《北平市电影业调查》中就认定:“北平市娱乐最重要者,厥为国剧与电影。”^⑮北平虽不是当时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但特殊的人口结构决定了这座城市与上海共同成为中国的最大的电影观众市场。

电影最初传入北京之时,并无独立的电影放映场地,而是作为一种附属品,依托于传统的茶馆、戏园,尚未独自经营。1904年,法国百代公司曾在东长安街搭设草棚,放映短片,当时人呼之日“腊人走戏”。同时,百代公司还在北京设分销处,发售影片及唱片,出租影片影机,并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三处每晚于京戏结束后加演影片,略收租费,这是北京电影业的重要源头。

1905年,一位美国人在长安街创办了平安电影院,这通常被认为是北京第一座专门电影院。同年,位于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经理任景丰邀请京剧大师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时长20分钟,在大栅栏大亨轩茶园放映,在京城引起轰动,这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制作史的一个开端。从1906年起,电影放映在北京城内逐渐增多,如文明茶园、吉祥园、和声园、新丰园、西庆轩茶园等等。这些地方规模都不大,只是临时的电影放映场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影院。

从1910年代下半期开始,一些正式的、规模较大的电影院开始在北京兴建。1916年,华北电影公司在东长安街开设了北京电影院。1917年,中央公园电影院开业。1918年,又有前门外香厂路新世界电影场、东方饭店屋顶花园电影场和城南游艺园电影场开业。不过,这一时期整个北京

的电影市场依然处在起步阶段,无法与传统的娱乐样式抗衡。

进入1920年代之后,电影在北京市民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许多戏院纷纷改建为电影院或加演电影,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由东安市场内丹桂戏园改建的真光电影院(1921年)、吉祥园改建的开明电影院(1925年9月改名为明星电影院)、香厂路的新明大戏院也从1924年开始增加电影放映。此外,北京先后新建了几座电影院,如中央电影院、中天电影院等。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1930年,光陆有声电影院在米市大街建成,设备与环境在北京都属一流。荣华电影园、同乐电影园、光明电影社、大观楼电影院也纷纷建立,至1930年代中期,北京电影院的数目已经有了明显增长,电影已经与戏园、茶楼分离,演出场所专门化,在都市娱乐空间中有了独立位置,扮演的娱乐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基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趣味等因素,政府公职人员、商人、新式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外国人构成了北京电影市场的主要观众人群。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观看电影成为新的社会时尚。与传统娱乐休闲场所如茶楼、戏院的喧嚣不同,专业化的电影院让人觉得舒适和安静。观众们通过大屏幕能够感知到一个超越现实的影像世界,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思想疆域,一些传统的禁忌被打破,在精神生活方面提升明显。同时,电影对社会风气的开化也起到引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新的时代风尚。

作为一种比较昂贵的新型娱乐方式,大规模之影院皆集中于城市中极繁盛区域,这种情况表明电影在当时还不能被更大范围的群体所接受。对于大部分北京百姓而言,显然还是对戏曲更加情有独钟,戏园、茶楼仍然是他们最常光临的娱乐场所。这不仅是因为百余年传统的积累,而且这些地方也成为了北京城市文化的一种特征,因而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电影院虽然作为新式的娱乐场所受到了北京市民的欢迎,但却无法替代戏园、茶楼在北京市民娱乐生活中的主要地位。

三、新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北京文化版图的扩展

明清以来,北京作为沿袭数百年的政治中

心,城市内部的空间是以等级与阶层设定的,尤其在内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空间。民国初年的北京,随着帝制的废除,一直是皇家私人领地的宫殿园林,陆续转变为博物馆或公园,皇家禁地变为平民百姓亦可窥一貌的公共空间。同时,由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北京城内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商业街区,帝制时代,城市形成了等级严明的政治空间,如今则向现代性商业空间过渡,这对于国人文化观念的冲击不可忽视。

帝制时代,“宫禁森严,上苑不开,城内除酒肆戏园外,几无游赏地”。^⑥城内仅有什刹海地区可供普通居民游玩,但地方狭小,又因各色人物聚集,秩序混乱。郊外诸多名胜亦因交通不便,只是社会中上层人物的“驻马听歌、赋诗饮酒”之地,与大多数居民仍属绝缘。民国建立之后,随着市政运动的发展,创办公园成为各地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凡一个大都市,人口总是有增无减,人口既多,公园乃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物品,并不是专为美观,实在是为都市生活不容不要的。”^⑦在公园地点的选择上,京都市政公所将目标瞄准曾经的皇家坛庙与苑囿。北京作为几朝帝都,皇家园林、坛庙众多,民国初期多是通过对这些场所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大众公园,“自帝制倾覆,废皇徙居,旧日之北海、颐和诸园,均已次第开放……兹述园囿,首中山公园、次中南海、次北海、次景山、次颐和园、次玉泉山静明园、次南苑。凡昔日帝后游幸场所,今咸为市民宴乐之地。”^⑧曾经的皇家御苑收归国有,被改建为普通民众能够进入的公共空间,暗含了社会的总体发展潮流。

北京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中山公园,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发起捐款创办,1914年10月向公众开放。开放之日,时值国庆,社会各界参观热情高涨,“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蹴瓦砾,披荆榛,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蹀躞柏林丛莽中。与今日之道路修整,亭榭间出,茶寮酒肆,分列路旁。俾游人憩息,得以自由,朴野纷华,景象各别。然彼时游人初睹宫阙之胜,祀事之隆,吊古感时,自另具一种肃穆心理”。^⑨

中央公园是一个文化气息很盛的地方,“它为民国文人交流学术思想、建构文化沙龙提供了优越条件,又是民国文人发生浪漫情事、表达故

园之思的寄情场所。”^③中央公园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当春秋之交，鸟鸣花开，池水周流，夹道松柏苍翠郁然，中外人士迭胜来游，流连景光不能遽去。至于群众之集合，学校之游行，裨补体育之游戏运动，以及有关地方有益公众之聚会咸乐，假斯园以举行。”^④既有景色怡人的环境，又是自由开放的空间，中央公园为文人构筑文化沙龙提供了绝佳条件，文人演讲、结社、展览、闲聊乃至宴会等集体活动都可以置于中央公园。《新青年》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国语研究会、新潮社、语丝社等团体在中央公园亦留下了诸多痕迹。蔡元培、胡适、鲁迅、章士钊、吴宓、戴季陶、于右任、朱自清、沈从文、萧乾、徐志摩、林徽因、老舍、李苦禅、张恨水等各界文人经常光顾这里。

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园正式开放，“是日虽然微雨，而各界游人，尚称踊跃”。^⑤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北海开放之后通过增添新设备，为游人提供了一些新的娱乐方式，如在园内添设电影场、照相馆、球房，购买新式望远镜数架，供游人远眺，设置游船备人乘坐等。同时，北海公园通过实行一些管理制度，对游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实际上也是对现代文明方式的一种普及。北海开放为公园之后，无论冬夏，均为北京城最受民众欢迎的场所之一。

除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外，中南海、景山、太庙也纷纷对市民开放。此外还有1915年开放的先农坛公园、1918年开放的天坛公园和海王邨公园、1924年开放的和平公园等。

逛公园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其娱乐主体最齐全，覆盖的人群范围最广，包含了城市几乎各个阶层的人士，但也各有侧重。以北海公园为例，“北海的所在地，因为临近北大与国立图书馆，所以在清晨，时有大学教授等等名流雅士，手提文明杖，漫步在荷叶青青、藕花艳艳的海岸”。^⑥参与新式娱乐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平民化。同时，公园既为市民提供了政治表达的空间，也为社会公共生活铺设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市民的生活空间不是彼此隔绝、相互无关的，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开始建立并感受到一种新的社会联系。随着帝制的消亡，特权领域收缩，公共空间扩展，旧的权力等级制度造成的空间分隔宣告终结。

在清末之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北京的内城以紫禁城为中心，受到政治制度、城市布局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呈现出绝对封闭性的特点。内城中形成了诸多禁令，如不准经营商业、不准有娱乐场所等，几乎不具有日常居住的功能，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只能居住在外城。清末民初，随着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北京仍然保持了“国都”的地位，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整个城市空间也从清代封闭性内外城旗民隔离进入到开放流动状态，同时形成了一批新的社会群体和职业阶层。这里驻扎了大量政府机关、高等学府、商贸公司，大批政客、知识分子、经济新贵集于此。由于有东交民巷使馆区，北京城内居住着规模庞大的外交官群体。他们大都集中在内城，形成了比较强的消费群体，为一些新兴商业街区的形成奠定了稳固的消费基础。

以内城南部的东长安街一带（指由东长安牌楼起至东单牌楼下东西一段大街）为例，这里在清代曾为衙署、宅邸聚集之地。清末庚子之乱后，东长安街南部的东郊民巷使馆区边界大为扩充，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市政建设。加之地理位置的便利，民国初年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城内最为繁华、高端、多功能的综合性街区。成书于1919年的《京师街巷记》对此描述：“街道宽阔，清洁异常。若远立南端，遥望北瞻，则楼房林立，高耸霄汉，一路花草，云错其间。夜晚电灯熄明，照耀有如白昼，直有欧风美景。”^⑦

东长安街两侧集聚着银行（中国银行、大陆银行）、洋行（美丰汽车公司）、企业（普利皮带工厂、永亨铁厂）、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等具有众多职能的机构，同时还有诸多新型政务机关如邮局、京汉铁路局、电报总局等。这里也是京城内上层社会的娱乐休闲中心，“此处饭店最多，若东安饭店，及大餐厅，长安饭店，电报饭店，北京饭店，皆系饭店中之著名者，然多系外资。”^⑧外人观察到的情形是，“沿街的北面，一带绿森森的树林，掩蔽着高高低低的洋楼，那都是洋式的旅馆，在禁止跳舞之前是车水马龙的去处。”^⑨

早在清代后期，由于流动摊贩的增多，内城不得经商的禁令就不断被打破。至清末，内城中心地区已经出现了众多纯粹商业性质的集市，如王府井、隆福寺、东单、西单、西四、鼓楼地区等。

以位于紫禁城以东的新兴商业街区王府井为例,1903年,集日用百货、饮食、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定期集市——东安市场在此建立,这片区域日渐繁盛。1906年,东安市场北部建立了吉祥茶园,园内每晚有京戏演出,这是北京内城的第一家。随后,东安电影院、会贤球社等娱乐设施在此纷纷开办,进一步增加了王府井地区的客流。宣统年间竹枝词形容:“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②7}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之后,正式开启了官方意义上的北京城市市政建设,首先选择了以王府井大街所在的内城左一区为示范区域,开始道路改造工程。具体内容包括拓宽道路、房屋基准线测量、整修明沟、铺装工事,修筑沥青道路等。1920年代之后,在王府井地区设立有轨电车站,极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为规模较大的百货店、银行、专门店等进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至1930年代,王府井地区已经成为北平最为知名的商业中心之一。

同时,民国政府对京城新型街区的规划建设也为其它新商业空间的形成提供了硬件基础。早在清末时期,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香厂地区就已经开始修筑道路,开辟新区。“当查香厂地面,虽偏处西南,而自前朝之季,已为新正游观之区。一时市女骈集,较之厂甸或且过之。是可验位置之适宜,人心之趋向。”^{②8}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选择香厂地区,在此规划建设一处集商业、娱乐、餐饮等于一处的街区,作为城市改造的示范区域,名“香厂新市区”。此后又制定街区地块标租、项目建设招标、市政市容管理等法规,修建市政基础设施以及一批新式建筑,引进各类商户。

新世界商场1917年由英国工程师麦楷设计,整体高五层,是新市区最主要的标识性建筑。屋顶为花园,内设有电影场、戏场、说书场、京津杂耍场、商品售卖场、地球厅、坤书宫、中西餐馆、咖啡馆、照相馆等。当时,场内已经配备了现代化的电梯,成为吸引顾客的重要招牌。开业后,参观游览者云集,民间有竹枝词描述其盛况:“香厂翻成新世界,如云仕女杂流民。五居楼阁冲霄起,戏馆茶寮百味陈。”^{②9}1921年,整栋建筑东半部毁于大火。东方饭店则是当时京城内第一座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的高档饭店。

在香厂地区附近,更加大众化的天桥市场、水心亭、城南游艺园等也随之兴起。1917年,商人卜荷泉等人在先农坛的东墙外建造水心亭商场。水心亭为木结构,玻璃窗,四周皆可以远眺。商场东北有茶社,兼营西餐。1918年5月,议员彭秀康在先农坛组建城南游艺园。园内有戏园、茶社、咖啡馆、旱冰场、保龄球场、台球、电影院、杂耍场、魔术场等,还在园外建一方形高塔,顶上安装四面大时钟。

上述这些新出现的这些商业中心对北京原有的城市空间进行了新的划分,但是,内外城的等级差别仍然存在。如果说,在清末之前北京城内的空间是以政治地位作为重要的划分标准的话,当固有的政治格局以及附着在之上的伦理价值体例破裂之后,当曾经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后人纷纷沦落之后,经济地位上升为最重要的因素。与内城中心的王府井、西单地区相比,外城地区在市政建设、消费水平以及商业品质上差距明显。尤其是天桥地区,“在北平自成小社会。不仅去买东西的人群是流动体,本地的居民也差不多是长日流动的。和伦敦的东区一样,天桥是北平的贫民窟。从露宿到鸡毛店,便完全解决了他们住的问题。天桥是游民在华北的一个部落。惯在王府井大街和东交民巷一带走动的人,是不会知道人间还有地狱的。”^{③0}

与此相映照的是,最初定位于中高端消费群体的“香厂新市区”虽也被官方重点扶持,但由于其偏于外城西南,交通不便,而京城内的高官、富商等上层群体多居于内城,导致客源不足,虽然也曾繁荣一时,但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随着新世界建筑的被毁而逐渐衰败。

余论

随着王朝的解体与帝制的消亡,北京的文化环境受到的冲击非常直接。精英文化被稀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直接接触,宫廷艺术走向民间,曾经尊贵的皇家气质与市井气味相融合,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形塑出民国初年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③1}

民国初期的北京,新旧文化并存,中西文化并立,传统与现代既直接交锋,也彼此吸收与借鉴,类型十分多元,这主要由这座城市居民的阶

层结构决定。作为曾经的“帝都”，既有满清贵胄遗老，也有大批政要与时代精英，这里从来不缺乏达官显贵，同时驻扎着数量可观的国外外交官群体。作为高校林立之地，众多国内顶尖学人在此聚集，还有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已经形成了颇具声势的群体。除此之外，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土著占据着底层社会的大多数。各个阶层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交集，因此也就无法产生交流与融合，这样的人口结构培育出北京多元文化杂陈的城市特质，哪一种类型的文化都无法在这座城市占据绝对地位。

注释：

-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77页。
- ②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
- ③《最近北京新闻界之里面》，《盛京时报》，1914年2月11日。
- ④《京师报纸之复杂》，《顺天时报》，1916年9月3日。
- ⑤《律师也要办报》，《顺天时报》，1916年10月16日。
- ⑥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
- ⑦倪锡英：《北平》，（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51页。
- ⑧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 ⑨老舍：《四世同堂》（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270页。
- ⑩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湾学生书局印行，2008年，第31页。
- ⑪中华图书馆编辑部：《北京指南》，上海中华图书馆，1919年，第10页。
- ⑫男旦原称乾旦，即近人指称戏曲舞台上的男扮女角，在中国戏剧实践中由来已久。从外在艺术形态而言，它是男性跨越自身生理性别的藩篱，以程式化的舞台语汇演示女性的艺术形象。
- ⑬醒石：《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戏剧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
- ⑭孙健主编，刘娟、李建平、毕惠芳选编：《北京经济史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6页。
- ⑮刘昌裔：《北平市电影业调查》，葛兆光：《学术薪

火——30年代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毕业论文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

- ⑯金受申：《北平历史上平民游赏地纪略》，《华北日报》，1935年5月22日。
 - ⑰京都市政公所：《公园论》，《市政通告》（第1—23期合刊）。
 - ⑱汤用彬等编著：《旧都文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 ⑲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中央公园事务所，1939年，第8页。
 - ⑳高兴：《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关于中央公园，还可参阅戴海斌《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 ㉑中央公园委员会：《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39年，第136页。
 - ㉒《北海开幕后之第一日》，《益世报》，1925年8月3日。
 - ㉓《大公报》，1933年7月25日。
 - ㉔宋世斌：《东长安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武学书馆，1919年。
 - ㉕宋世斌：《东长安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武学书馆，1919年。
 - ㉖姚克：《北平素描》，于润琦编：《文人笔下的旧京风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 ㉗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13种）》，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23页。
 - ㉘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关于劝业行政事项”，1914年，第104页。
 - ㉙王开寅：《都中竹枝词》，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 ㉚钱歌川：《游牧遗风》，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三联书店，1992年，第567—570页。
 - ㉛赵园指出：“清王朝戏剧性的覆灭，使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对于造成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为力甚巨”。《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相关研究还可参见林峥《从〈旧京琐记〉到〈城南旧事〉——两代“遗/移民”的北京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张燕清）